

李星可的社评及其时代意义

Ly Sing Ko's Press Editorial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蔡莉玫*
(CHAI Lee Mei)

摘要

李星可是新马华文报业史上一个风云人物。他在60年代以写社论著名。身为外籍华人,李星可尝试把故土的养分——文化带到侨居地。于是,他开始了用笔杆儿争取文化认同的报人生涯。新马在英殖民后曾分区自治,1963年合并,并且在1965年正式分家独立。长期受到“英文至上”环境影响的新马,在1953年毅然冒起南洋大学(南大)这朵奇葩。南大是海外的第一所华文大学,因着教学媒介语的问题,长期受到外界的质疑。李星可出于爱护母语教育之心,不遗余力地为南大仗义执言。本文针对李星可在60年代对于南洋大学事件所写的社评进行概括性的论述,以突出他对母语教育的坚持,并且见证他在新马华文教育史上建构的篇章。

关键词: 李星可、华文教育、社评、南洋大学

Abstract

Ly Sing Ko was a leading journalist and editor of the Chinese press of Singapore and Malaya in the 1960s. As a Chinese expatriate, he tried to infuse elements of Chinese culture into his place of residence. He devoted his career in journalism to fight for cultural identity. Singapore and Malaya were administered independently during British colonial period. They merged to form Malaysia in 1963, but Singapore separated from the federation in 1965. Despite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English was given pre-eminence, Nanyang University (Nantah) was nevertheless established in Singapore in 1953. As the first 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y in which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is Chinese, its establishment was subjected to heated debates. Arising from his love of mother-tongue education, Ly Sing Ko had tirelessly defended Nantah in its use of Chinese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several of the press editorials drafted by Ly Sing Ko in the 1960s to highlight his devotion to Chinese education.

Key Words: Ly Sing Ko, Chinese education, press editorials, Nanyang University

* 蔡莉玫 新纪元学院学术部讲师兼研究员。电邮地址: leemei.chai@newera.edu.my

一、前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新马有一个群体的华人，他们身在海外，心在汉阙。二战结束后，由于自治独立大势所趋，越来越多华人放弃了中国国籍，成为当地的公民。虽然离开了那块土地，他们却想尽办法把故土的养分带过来，这养分就是文化。而文化跟教育往往是孪生体，于是便开出了本土华文教育的果实（潘永强、魏月萍编 2004：156）。这当中，李星可是其中一位通过华文报章，鼓动华人孕育文化意识的报人。他维护华人利益，尤其对母语教育、南洋大学的爱护，出于赤诚。

李星可（1914-1996）生于北京，是满族人。先辈从商，经营钟表生意多年。早年在北京大学和中法大学进修中法文学，精通中、英、法三语。他获奖学金前往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欧洲中古哲学，后到巴黎大学学习，攻读欧洲文艺复兴史。

李星可在抗战时回到中国，投身新闻界。在中国抗战期间，也是中央通讯社驻越南海防和仰光特派员。他曾在《大公报》当记者，他第一篇通讯稿刊出后，《大公报》就被西贡政府禁止入口。

战后南来，李星可历任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讲师。1961年，他接受新加坡《星洲日报》聘任为主笔，1971年转到新加坡《南洋商报》任主笔。他在50至70年代的新马文坛上极负盛名，报生涯长达60年。

二、新马华文教育的历史背景

新加坡开埠初期，莱佛士以方言群身份作为市区划分的一大原则。19世纪70年代开始，殖民地政府积极争取海峡华人的忠心，并采取措施抗拒中国政府对新加坡华人的影响。独立之后，国家领袖努力塑造人民对这个年轻岛国的国家认同感。19世纪70年代末，为抵御“西方歪风”的吹袭，政府又催促各种族抓紧母族文化的根。由于长期处于身份认同意识的分化演变，华人虽然一直占新加坡全人口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也是进入了主流，但他们始终都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族群。

李星可在战后南来，适逢迎接了以上阶段所结出的果子。在新加坡华人身份上是国家公民，灵魂上还没有的建国初期，李星可挥动如椽之笔，再三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吁请人民把新加坡视为永久故乡当儿，也积极维护并争取自身的民族文化获得宪法保障及公平对待。

二战前，新马华文教育的发展已完成从小学到中学的阶段，而华文中学的毕业生亦可以到中国的大学深造，因此当时的华文教育已然相对成熟与完整。然而，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华文教育备受摧残殆尽。日本在1944年废除华文，专授日文，对华人子女实行战时奴化教育。

战后出现了短暂的光复发展，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华文教育的一大挫折。1948年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大批南来文人被遣返回国。¹ 新马各地华校的师资向来依靠中国南来的文人，遣返他们首当其冲的就是致使当地华文中小学的教师队伍出现紧缺。另外，英国当局在1953年提出了双语教育方案。根据此项计划，新加坡华文小学的三分之一学时，初中的一半学时，以及高中的三分之二学时，须以英语为教学媒介。此项计划马上遭到华人社会的反对。1954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华校教师联合会支持下，有条件地接受此计划，即新加坡4种源流（英文、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学校必须实施同一计划。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还要求政府向华文学校提供更多资助，但遭英国当局拒绝。英国当局还不准许华校学生到中国大陆的学校深造。（周南京 1995：327）

当时新马地区上只有一所马来亚大学²，学额不多，只吸纳英文中学毕业生，不收取华校生。50年代初期，李星可与庄竹林博士，首先向陈六使提出创办华文大学的。（李星可 1991：83）当时庄竹林主持新加坡中正中学。学生高中毕业后，因为没有升大学的机会，就开设深造班收纳这批高中毕业生，请李星可去教书，李进了法新社没有去，庄李二人谈起新马应设一间华文大学以供华人子弟以华文受大学教育。他们空有理想，因为拿不出大笔钱来兴办大学，就把这个创办大学的理念告诉陈六使。陈六使想起陈嘉庚创立厦门大学的经验，认为为了华人子弟打开一条升学的道路，可以一试。于是在1950年9月9日新加坡福建会馆为其辖下各学校筹款，举办盛大义演，陈六使受邀致词，他第一次公开倡议创办一间华文大学（即后来的南洋大学）的建议，并呼吁新马各位贤达共促成之。³

李星可继而把持笔政，为南洋大学仗义执言。从创办一直到争取学位受承认到改制，他所写过有关南大的社评包括〈南大特委会报告书顺利完成〉、〈南大的前途〉、〈南洋大学绝不并入马大〉、〈南大问题应该从速解决〉、〈对于南大毕业生的再评价〉、〈南大前途的新展望〉、〈南大教学媒介语问题现在澄清了〉、〈星加坡政府宣布承认南洋大学学位〉等作品。

“九一八事变”在李星可的写作生涯中起了很大的冲击和启蒙。当时他还在大学里读书，正沉湎于诗情文采当中。他和同时代的青年一样，忽然觉悟提笔为文所当追求的是如何充实自己对现实了解的认识。笔墨口舌，才华文采的卖弄，在当时变成人所讨厌的东西。（李星可 1968：4）他称这是他人生中最宝贵的个性养成阶段。时代赋予了他思想接受与成熟的契机。自此，李星可真正拿起笔来从事有所谓的写作了，并且明白了“写作不是文采，而是内容”的真正诀窍。

对于社论的写作，李星可认为它至少必备“出得厅堂”、“有所谓言”、及“说服力”的特色。⁴（李星可 1968：5）他认为社论最重要的部分是它的内容。好的内容至少

¹ 1948年6月，马来亚英殖民政府颁布镇压马共的“6·20”紧急法令，在全马（包括新加坡）实施。英殖民政府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封禁马共及其属下的组织，逮捕和扣留被怀疑为亲共的人士。

² 1948年2月建立马来亚联邦后，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和爱德华七世医学院（King Edward VII College）于1949年10月8日宣布合并成立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

³ 引李业霖口述资料。

⁴ 李星可认为社论必须具备的特色：一、文笔必须有起码的水准，能拿得出来，被上中下各等人才雅俗共赏，不能一出场就有人能嗤之以鼻；二、一定是有所谓的，而且是为他不会自我呻吟，也不会是拼凑成篇的白豆腐；三、一定是为了给别人看的，所以一定最能言简意赅，一针见血，最精辟，最富说服力。

要靠作者的理论学基础、专门学识和作者的人格来支撑。⁵（李星可 1968：6）他说，社论不会是单纯的纯客观的事实分析，它一定有“是”有“非”。因此，社论会比任何其他种类的文章都更容易表现一个人的人格。（李星可 1968：7）

李星可对他自己的社论极端重视，不能改动一字。1960年代，胡蛟借助李星可，把半死不活的《星洲日报》振兴为独霸新、马华文报坛的舆论权威。（《东南快报》2005年1月6日）1970年初，全道章主持《南洋商报》，他非常欣赏李星可的评论文章，把原在《星洲日报》现任主笔的李星可请过去，月薪6000叻币，而全道章本身为总编辑也不过5000元月薪。

李星可是个多产作家，著书约30本，有话剧、京剧、小说、政论、及翻译小说。他的著作包括《报穷》、《快艇》、《乱世沧桑》、《乱世春秋》、《标准华语》、《我谈京剧》、《怎样欣赏中国戏》、《南洋与中国戏》、《爱与恨》、《京戏脸谱》、《京戏丑谱》、《亚洲作家短篇小说选》（编译）、《借东风》、*Hanoi Peking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The Problem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等。

三、李星可的社评特色

李星可在60年代以写社论著名。他所撰写的社论，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而有力，能做到论点统帅论据，论据说明论点，观点与材料统一。他的社论言简意赅，言人不敢言，一针见血，而有独到见解，掷地有声，富有说服力，读者都爱看，给予好评。

他的社论，结集为三本书，《政论选集》、《政论新集》及《政论近集》。他常用“数典忘祖”（即忘本）来评论当权者，对母语的立场，又用“二毛子”（即不中不西，非驴非马）来形容当权者的心态，狠触他们的忌讳。当权者对他恨之入骨，对他视为眼中钉，要除之而后快。⁶

李星可对于南洋大学一直有着特别的情愫。1960年代，南洋大学正处于争取学位受承认的阶段。在这过程，李星可不遗余力地为南大仗义执言。在他看来，南大问题的发生不在《白里斯葛报告书》⁷与《魏雅聆报告书》发表以后。（《星洲日报》1962年4月10日）南洋大学因着教学媒介语的使用，长期处于被质疑的状态。对此，李星可的言论大部分集中于讨论媒介语的使用不影响大学本身的素质。在他观点，只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切问题皆会迎刃而解。

⁵ 李星可认为好的内容要靠三个条件：一、作者的析辨事实的能力，即理论学基础；二、对事实本身的认识，即专门学识；三、他的用心，也就是作者的人格。

⁶ 李星可的社论，每篇都由文化部的翻译员译成英文。先前的翻译员是一个妇女，对他的文章很欣赏，关键文字译得较文雅，当权者看时，并不感到刺目捶心，后来这妇女退休了，由一个男的承缺。这个男翻译员对李星可无特别赏识，对他的社论没有小心体谅，译得粗线条。当权者看了，就感到不是味道，感觉上李的社论完全针对他。这样一来，他最后遭殃了。

⁷ 1959年1月，南洋大学与政府同意共同聘请西澳大学副校长白里斯葛教授（Prof. Stanley Prescott）、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洪煜莲博士、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博士、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胡恩威博士（Dr. A.E.P. Hulsewe）、菲律宾大学教授谢玉铭博士担任细察南大的学术水准的评议委员。

1959年7月22日,《白里斯葛南大评议会报告书》发表,宣称南大学位不能与其他被承认大学学位相等。《白》书发表次日,新政府又另外任命一个委员会检讨五人委员会的报告⁸。1960年2月9日,《魏雅聆报告书》正式发表,基本上与《白里斯葛报告书》大同小异。

李星可在南大第一届毕业典礼当天发表了一篇评论。他认为《白》、《魏》两报告书针对教师与设备的评鉴而致使南大学术水平受质疑是不合理的。他说,这样的调查充其量只是一个行政上的问题。它可以作为政府考虑承认南大所颁给的学位的参考,但对南大的真正学术水平,尤其是毕业同学的个别成就,目前还不能遽下论断。(《星洲日报》1960年4月2日)

对于南洋大学,李星可认为它之所以受“鄙视”,最主要是因为英殖民主义所留下来的“英文至上”观念。他说,许多人以为如果放弃英语,我们就将自绝于先进的现代国家世界:不通过英文不能做生意,不通过英文不能研究学问,不通过英文不能渗透国家政治。(《星洲日报》1963年1月17日)事实上,像印度从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仍然只用英文为官方语言,虽然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民懂得起码英语,但仍宁愿自绝于本国人民,不愿自绝于“世界”(其实只是“英语”世界)(《星洲日报》1963年1月17日),这只是在助长英国为了保障其国家地位,伸张其在远东影响力的目的罢了。(《星洲日报》1962年3月13日)

李星可认为受英文教育并不是坏的,坏的是不明白其他的语文。(《星洲日报》1961年7月4日)他觉得如果认为只有英语才适合大学教学之用,那纯然是一种迷信,因为:(一)真正的学术研究绝不是一两种语言的知识就已足够;(二)英语本身就不能单独作为高深学术研究之用,某些科学名词仍须配合国际现实采用希腊拉丁文字;(三)而就科学的语言学观点来说,今日的世界已经找不出一一种真正落后的语言。(《星洲日报》1961年9月12日)

李星可多次提到“我们的医生至今除了不能为讲土语的本地人直接诊病,法官律师不能直接用土语听讼,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不能直接查看本地的土语报纸”⁹。这说明了教育的目的原本是为国育才,但重要教育机关里所使用的媒介语仍然是过去殖民时代的英语,不能配合本地老百姓的实际需求。(《星洲日报》1961年4月16日)

⁸ 新委员会由7人组成。主席是魏雅聆医生,其他委员包括翁姑阿都阿芝、符气林、马来亚大学教授黄丽松、廖颂扬、《南洋商报》总编辑连士升、B. R. 史林尼哇山组成(两家主要华文报的总编辑、马来亚大学的两位教授及两位专业人士)。

⁹ 参李星可〈从提倡国语到改造大学教育〉载于《星洲日报》,1961年9月12日、〈星加坡大学明日诞生〉载于《星洲日报》,1961年12月31日、〈星教部决定加强小学母语教学水准〉载于《星洲日报》,1962年1月16日、〈展望星加坡的高等教育〉载于《星洲日报》1962年2月13日、〈东南亚教育制度的改造〉载于《星洲日报》,1962年2月25日、〈从香港政府考虑开办华文大学说起〉载于《星洲日报》,1962年5月13日、〈本邦英校中的华语问题〉载于《星洲日报》,1963年1月13日、〈第二语文今年是必修课〉载于《星洲日报》,1965年1月7日、〈南大前途的新展望〉载于《星洲日报》,1965年9月14日。

以半殖民地社会的通病，常是当地社会人士，往往所受的教育程度愈高，愈与本地社会脱节。不但在思想上，就是他们日常所使用的语言甚至都无法与真正的本地人彼此互通（《星洲日报》1962年6月12日）。在1967年9月19日，李星可在他的社论〈英文教育的真实价值是什么？〉里评论道：

事实上，英文教育不但未曾帮助打破种族界限，其实更在种族界限之外，制造新的语言隔离，说英语的成了与上层同化的“优秀份子”，只讲土语方言则留为下层贫民。而且，英语的变态繁荣在马来亚延宕了国语的顺利进行，在星加坡则把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的华人自身倒划分成两个不同的集体，其他的种族可以以此类推。

（《星洲日报》1967年9月19日）

在1945年以前，英属殖民地，除了少数例外，几乎都没有办过大学。李星可认为，当时的高等教育，所遵行的路线一直都是1945年阿斯奎兹报告书的建议内部。¹⁰（《星洲日报》1962年3月15日）因为在二次大战前的英国人眼光中，他们的传统成见是认定殖民地的高等教育应该只限于制造少数的特殊知识分子，绝非当地中学教育之续，尤其不在尽量提高和普及本地高等教育。

因此，马大在1949年创立之时，它就绝未顾及到新加坡本地中学生的数量与实现。首先是当时为数不少于英校的华校中学毕业生，他们因为遭受歧视，迫得不能不在如魏雅聆所说“通常到海外就读”。所以，新加坡的高等教育，从一开头起，就是一个复杂微妙的政治问题，不能根据一些原则理论来衡量窥测。

南大的成立，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促成的。它不能符合魏雅聆的三原则。李星可声称：（一）就华人的立场而言，我们不赞成高等教育只能留为少数特殊阶级人物的专利品。我们几千年来始终遵行“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原则，“有教无类”，认为有中学就应该有大学，最好每个中学生都能读大学；（二）我们的钱不够可是也非办不可，因为华校中学的毕业生当时既不能升入本地大学，而“通常到海外就读”又已此路不通，所以不能不自办大学；（三）学生的出路是社会的问题，不是学校问题，在任何国家也没有说高等教育毕业证书就等于饭票的，所以这个“先决条件”在我们看来是不必先决。（《星洲日报》1962年2月13日）

在李星可认为，南大有必要存在，因为它是一个关系整个社会的公众事业。（《星洲日报》1959年11月22日）它既承担着提供新加坡人民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责任，同时亦担负着建构新兴国家本土文化的重任。他说，既然新加坡已经脱离殖民，就应该建立自己的本土文化。在马来亚，全人口的总数不过八百多万，使用的主要语言却有三、四种。因此，南大采用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原是事实上的必要，华校中学的毕业生必须有深造的机会，华文大学的存在是适应环境的必然结果。（《星洲日报》1960年4月2日）

¹⁰ 这个报告书的主要精神是：殖民地大学的主要任务在于为未来的政府制造领袖人才，因此，“受教育的以及半教育过的人不可令其人数过多，而且必须令其学必有用（不可令其失业）。”这种精神实际上与老大帝国时代的中国科举制度毫无二致，它的目的仅为政府行政机构储备特殊阶级的白领人物，而且为了保障他们的效忠，要尽量限制他们的人数，而避免让他们因而失意失望而变成捣乱份子。

四、李星可书写的时代意义

1959年，新加坡组织民选自治政府，颁布新的教育政策。新政策基本上环绕在“达致团结——不同种族朝向一个共同的意识和效忠新加坡”的最终目的。政府标榜平等对待四种源流学校，给予各类型学校经费以及建校等补助；划一各源流学校之教师薪金制，借此消弭各源流学校的矛盾与猜忌。为了消除各种族语文的障碍，促进彼此了解与巩固国家根基，政府决定由1966年开始，在四种语文源流的政府辅助学校，规定第二种语文为必修科。（崔贵强 1994：273）

然而，英校推行第二语的政策，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除了涉及课本、师资及教学方法等问题外，更大的障碍是英校生一向鄙视华文，认为学习华文没什么使用价值。有些家长也认为，花时间学习华文将影响英文的成绩，因此不鼓励孩子学习华文。

华校之英文教学同样收效不大。政府为了打破种族间的隔阂，推行广泛应用英文，特于60年代倡设了混合学校（Integrated Schools）。在同一校园内，容纳了几种不同源流的学校，安排不同的学生参与共同的课外活动，让他们有机会进行思想交流。

新的教育政策虽有诸多创意，但万变不离其宗，仍然以英文为主体，以致造成英校生激增，华校生锐减的现象。李星可一方面赞成第二语教育的政策，认为这是结束过去殖民地时代的教育政策的第一步，同时亦为母语教育之危机深感忧心。

他主张华人应该从小接受母语教育，因为只有能掌握好自己的语文，才能更好地将母族文化遗产吸收，并且传递给他们的国家。（《星洲日报》1960年4月2日）在他看来，只有了解自己文化传统的人，才有魄力，如果铲除母族文化传统，一切都是空洞的。¹¹（《星洲日报》1966年9月6日）

他认为受过比较高深的教育的几乎没有例外的都是一些“白领”人物。他们与本地人民虽然同种同族，但因为他们的教育背景完全洋化，在思想意识上与真正本地人民的距离，几乎跟洋人一般无二。

他们虽是国内唯一受过高深教育而有组织能力的人，所以能成为国家的领导者，但他们当初所受的教育可惜与本地文化并非同源，因此，在本地文化抬头之时，又有可能把它目为“沙文主义”或“盲目爱国主义”。这是一种新的矛盾。

“在许多过去曾是殖民地的国家中，普及与提高教育的主要障碍之一是教学媒介语的限制。许多业已独立自主的殖民地国家，依恋于殖民地时代的回忆与憧憬，甚至在独立自主之后还依然以为非原来宗主国所使用的语文不足以办学；这样一来，学生花费于外国学

¹¹ 他说，一个受英文教育的学生跟一个受华文教育的学生来比较，那受华文教育的，他的背景，特别是文化方面的背景和态度，表现出有足够的魄力和信心。至于英校，你学的不是自己的语言，你在学校所念的书大部分跟你生活没有关系，结果心里有矛盾。

习的时间已然是绝大部分的精力，还谈什么普及教育？提高教育？”（《星洲日报》1962年2月25日）

李星可甚至主张“小学教育必须强制入母语小学。自行选择，分别源流，要从中学起才准许。”如此，则不仅保护了母族文化传统不致丧失，同时也保障了少数种族的文化权利。（《星洲日报》1966年11月4日、1966年12月27日¹²）

此外，他也希望母语教育出身的学生应有充分的升学机会。那么，南大学位早日获得承认，以及多设立高等学府，以让学生有更多的升学机会，是一项当务之急的事情。

李星可始终不相信英文教育可以是“代”母语，或者是“同”母语，尤其不可能是“超”母语的。（《星洲日报》1967年9月26日、1965年9月16日¹³）而且，新加坡的纳税人民不限于英语公民，国家没有理由不让那些华文教育源流出身的学生享受平等待遇，同样可以升入本邦官立的高级学府。（《星洲日报》1962年3月13日）

他引用一位学贯中西方的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教授的话说：

华人只受英文教育的最大缺点在于中国人文传统的根除。他们所受的英文教育，就是长达十三年之久也还是肤浅的。只有极少数的优秀学生受过良好的英文教育，才能深入而获得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来代替所丧失的中国文化。可惜大多数的人民对肤浅的英文教育感到满足，因为职业上他们得到保障，生活上得到享受。有些可能成为专业人才而对自己的英文教育感到自豪，反而轻视起来那些受华文教育的，这种态度与思想就是殖民地时代所造成的。不过在精神上这种华人浮在物质的享受中而缺少稳定的文化或道德标准。……他们身体与情绪上虽是华人，文化与精神上却非华人亦非英人亦非印或巫人：他们也许不明白自己是什么人！从殖民地统治者的观点说，这种没有本性的被统治者是最容易控制与利用的。……使人觉得奇怪的是很多学者似乎不能领略到本地华人接受纯粹的英文教育所产生的“文化丧失”的效果（Deculturizing Effects）。有些人建议通过英文教育以“同化”华人，但是他们却没法指明要把他们同化成什么。

（《星洲日报》1966年9月6日）

结果当然是把这样的华人同化成一种非驴非马的四不像，那就是所谓的“二毛子”或者“假洋人”。李星可认为作人的基本道理第一件事就是不能“数典忘祖”，所以呼吁作家长的人们，对于自己的子女，至少是小学教育必须让他们受母语教育。（《星洲日报》1966年5月6日）

¹² 1966年12月27日的〈有关教育建国大计的几个基本问题〉也提到小学母语教育必须是强迫性的不然大家势将都选择英校。

¹³ 李星可在1965年9月16日〈关于调整南大课程的几点疑问〉举例英国政府在1954年所发表的阿斯奎兹报告书中说：“在各殖民地中大学教育的最难解决问题之一就是教育媒介通常使用英语，而英语又时常并非学生之母语这个事实。”可是，“学生升入大学是否适合，第一件事就是取决于他能否掌握教学媒介语。他对于所听授必须明白得心神领会，而自己对于这种语言也能运用自如，才不致妨碍他的学识发展。我们由经验得知，学生为满足此种条件，即使教学用语为其母语而非易事，如为非母语之外国语自然更难。”“（学生所需之）努力不仅为适用此外语，而且为学习用此外语思维。但除非完满的掌握成功，学生不仅将在学习中遭遇困难，即在心理上所引起之混乱也可能是真正有害的。”

实际上，当时的新马华人大多是掌握多种语言，其文化价值也多面取向，很难界定某人完全及永远属于某个社群。若以何国忠在《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一书，分类马来西亚华人的“华”的成分的方法¹⁴（何国忠 2002：275），来分类新加坡华人，他们的教育背景可分三类：

- 1、华文教育：小学、中学受华文教育。
- 2、华文、英文教育：小学受华文教育，中学受英文教育。
- 3、英文教育：小学、中学受英文教育。

就李星可鼓动人民受母语教育的立场来说，他主张华人必须1，其次2，坚决反对3。

李星可仿佛感觉到受华文教育与受英文教育的人，对于华人在身份认同与国家建构上追求的目标、期待与焦虑，都有理解上和认识上的“对峙”。因此，为加强他本身的立场，李星可多次在他的社评上使用“数典忘祖”、“非驴非马的四不像”、“二毛子”、“假洋人”来形容拒绝接受母语教育的人。

而当时以至今日，新加坡政府从初期延续殖民时期政府传统，到今日因不曾换过政治班底，都由受英文教育者主导政治。基于对母语教育的拥护，李星可和政府之间似乎有一些说不清的对峙。

李光耀在他的《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里提到，他永远忘不了1958年3月31日那天，从南大到武吉知马和市区的14英里长的道路上，堵满了像蜗牛般爬行的汽车，全是要去南大参加该校建筑工程第一阶段的竣工典礼。他因此感受到说华语或方言的普通民众对创办南大满怀激情。（《南洋商报》1998年9月30日）

由于必须照顾受华文教育者的感受，以及继续取得华人社会的支持，即使李光耀担心南洋大学将成为共产党渗透的中心，并且与他认为是华文沙文主义者，也是支持共产党的南大发起人陈六使对立，他一直无法对陈六使和南大采取行动。（《南洋商报》1998年9月30日）

李光耀承认他从1959年出任新加坡总理以来，就等待时机对付陈六使。结果，南大学生会和陈六使在1963年人民行动党面对最大考验的选举中，支持左派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而人民行动党出乎意料地在选举中获得大胜后隔天，李光耀就以“以维护华族语言、文化和教育为藉口，在共产党人（指社阵候选人）起草的名声上签名，谴责政府...”，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

¹⁴ 何国忠把马来西亚华人分成五类：1. 华文教育：小学、中学受华文教育；2. 华文、英文教育：小学受华文教育，中学受英文教育；3. 英文教育：小学、中学都受英文教育；4. 华文、马来文教育：小学接受华文教育，中学接受马来文教育；5. 马来文教育：小学、中学都接受马来文教育。

李星可与陈六使的命运相似。1971年5月2日凌晨，新加坡政府引用内安法令逮捕了新加坡《南洋商报》五委员即当时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仝道章（即仝一）、主笔李星可、人事经理兼公关经理郭隆生四人。政府发表文告说，他们主持下的《南洋商报》“一方面炫耀共产主义，同时又借语文和文化问题鼓动种族和沙文主义情绪”。（《南洋商报》1971年5月3日）

这件事情，一般称为“五月风暴”，轰动新马社会，掀起轩然大波，也引起国际的关注。在赫尔辛基的国际会议上，也讨论“新加坡《南洋商报》经理与新闻从业员未经审讯而遭扣留事件”，认为是国际新闻史上一大事件，认为有压制新闻自由之嫌。

反观当时社会，新加坡在1963年9月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但基于新加坡和联邦政府在政策上存在着基本的分歧，1965年8月9日它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迫不得已宣布独立。

新加坡当时的问题是，它国家小，而它在人口的构成成分与周遭各国不一样，它以华人占大多数，情势酷似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孤立地位，因为与亚洲最大势力的共产中国有血缘关系，因此时常被称为“第三中国”，也时常有可能被挤压在“反共”与“排华”的夹缝中。

“反共”是当时东南亚政治的主流，世界共产主义大本营当时已经不在莫斯科，而是在北京。因此，“反共”与“排华”的分别与联系就成了海外华人安危的一大决定因素。

李星可一直坚信着“只要有教育，其他宗教、文学、思想等等，迟早必定会出现。然而，只要你没有教育，其他宗教、文学、思想，乃至风俗礼仪等等，迟早必定会消失，而且难以再回来”。因此在“反殖民主义”与“反华”的浪潮夹缝之下，他冒着随时被戴上一顶红色帽子的危险，依然主张“从小母语教育，终生母族文化”。

1965年初，王赓武等被委任“检讨南洋大学目前课程制编制及各科内容，以便向大学提供适应当地社会需要之修正课程”。王赓武在5月14日呈上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建议施行新学位制。¹⁵ 9月11日，报告书正式发表，因一如既往地推崇“英文至上”的教育政策，更严重质疑华文教育的必要性，因此引起维护南大的各阶层人士非议，认为《王赓武报告书》有意改变南大的教学媒介语，抑或将南大变成一间副牌儿的英文大学。（王赓武等 2002：308-322）

¹⁵ 《王赓武报告书》的主要内容包括：除三年普通学位学制外，增设荣誉学位课程；实行新课程，以使南大能够收容所有国内各源流教育出身的学生；各学院若干学系应作适当调整，增设马来学系，并设立语言中心；建议停办三个学系（即现代语言文学系、教育学系和化学工程系），将中国语言文学系易名为汉学系；提高教师待遇并提供充分研究机会与设备。此外，课程审查报告书还指出“语文训练已成为南大将来发展的主要课题之一”，“我们承认南大在给予马来西亚华文媒介学校的毕业生有机会受高等教育这方面，仍须扮演一个角色，而且仍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讲授媒介语，然而，只精通华文显然是既不符合毕业生本身的利益，而且南大继续造就这类毕业生也不符合国家利益。”

针对《王赓武报告书》，李星可要求委员会注意新加坡政府与南大代表在1965年6月6日所达致的协议，即“再三保证继续以华文为南大的教学媒介语”。李星可同时要求新加坡政府继续保留马来西亚宪法下的“教育自主权”，以平等对待四大教育源流政策。（《星洲日报》1965年9月16日）

他引用一家西报发表的评论说：

一间纯华文的大学在诸多方面都不合新加坡的社会现实。……所以，要想提高水准，南大……的学生必须训练使能通过非华语的其他语文听课……

该报进一步主张：

“把南大由单一语文的大学转变为多种语文的大学，由为一部分人民服务进而为整个社会服务，这需要详细厘定一套办法。而且，这样的改变在逻辑上必须是中小学阶段起就这样做的。”

李星可认为，若照该西报所说，南大如果必须变质，此后则连带所有华文中小学校都必须跟着一律蜕变。那么，新加坡之所谓的华文教育，到头来还剩下什么？（《星洲日报》1965年9月16日）

李星可仿佛预测到，新加坡将有“华文教育蜕变”的一天。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为了与马来亚合并，曾经采用马来语为国语的政策。不过，在1967年以后，新加坡政府决定放弃马来语为国语，而恢复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曾少聪 2002：461）从1987年开始，新加坡实行双语教育制度，学校不再有语言源流之分，学生在学校接受英文为第一语文，华文为第二语文，或反之，实际上都是削弱华文的教育地位。因为，学校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课程占了八分之七，课外活动几乎全以英文进行。（吴庆棠 1997：253）

话说回来，《王赓武报告书》自1965年发表后，新加坡政府对南大的人事、学制、教学媒介语等进行了一连串的改动，使南大进一步远离作为华文教育最高学府的特质，违背当初创校的宗旨。

1968年5月25日，南大举行第九届毕业典礼，新加坡教育部长王邦文在致词时，宣布新加坡政府正式承认南洋大学所授予的学位。然而必须看到，经过十多年的泪水和血汗洗涤，虽然南洋大学终于被政府承认，但已不是当初万众一心建立起来的民办大学了。

1973年11月，新加坡政府宣布为“配合南大与新大统一招生原则”，由1973学年起，停止招收马来西亚学生。这对南大打击很大，因为南大学生过半是马来西亚学生，新加坡人只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在马来西亚华校中，南大占一重要角色。（李业霖编 2002：392）

1977年底，李光耀在新加坡大学¹⁶ 一场演讲会上，强调政府有责任确保南洋大学的改组事在必成；他在南大历史学会另一场演讲中则指出：南大改革用英语媒介的大学，所遇到的障碍，在于南大校园是根深蒂固的华语环境，英语的运用不容易在这种环境里建立起来。因此，在1978年3月，南大理事会和新大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由本学年起，新大在武吉知马的校园，将成为新大和南大共同课程的联合校园，让南大能在讲英语的环境里学习，提高水准。

联合校园计划下，南大与新大学生一样，接受共同的课程，共同的讲授及共同的考试。但申请入学的学生则继续享有自由选择他们想要进入的那一间大学。

1980年3月，李光耀基于：南大师资缺乏，难以聘请资深的师资；学生宁愿选择进入新大而不愿进入南大的趋势，建议南大新大进行合并。1980年7月，南大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随着第二十一届毕业典礼，南洋大学消失了。

五、结语

对于140多年来深受殖民地“英文至上”思想影响的新加坡，李星可始终主张“从小母语教育，终身母族文化”的理念。他认为“只要有教育，其他宗教、文学、思想等等，迟早必然会出现。”。通过他如椽之笔，李星可鼓动华人极力追求受母语教育的权利。

新加坡虽然由大多数华人组成，李星可亦不忘记其为多元种族之国家，各族间应彼此尊重的道理。因此，他提倡“第二语文”的教学政策。李星可严己宽人，要求自己民族学习别族的语言，以沟通异族间的感情。

在维护华文教育的当儿，李星可不忘记华文教育之根本，乃是母语教育。因此，他在争取南洋大学学位受承认的阶段，花了很大篇幅来阐述母语教育的重要。他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母语，才能很好地掌握和传递母族文化。而南大身为华文教育的最高一环，集“语文是媒介，教育是载体，文化是内涵”的特征，应该是很好发展本国文化与沟通东西文化的角色。

“英文至上”的趋势促成李星可对母语教育的焦虑。他似乎拥有先知的能力，预料“第二语”教育将有取代母语教育的可能。因此，在苦口鼓动华人接受母语教育的同时，他也要求政府平等对待各源流学校。从另一角度来说，李星可亦为他族作出母语教育斗争的工作。

李星可常用“数典忘祖”、“非驴非马四不像”、“二毛子”、“假洋人”来形容拒绝接受母语教育的人。1971年5月2日，李星可因着“谴责政府试图压制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把李光耀描绘成‘数典忘祖的二毛子’的政府里的压迫者”的罪名而入狱。（李光耀 2002：592）

¹⁶ 新加坡大学：1905年设立的英皇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和1927年设立的莱佛士学院，于1949年合并为马来亚大学，分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和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其中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在1962年分离出来，改名为新加坡大学。

李星可的命运与华文教育分不开。他在争取华文教育这条路上，为其受过不少认同和指责。在争取南洋大学学位受承认的过程中，李星可通过叙述、辩驳、谴责、催促、澄清、提议、忧虑、抗议、期盼等的情感，化为他的写作内容，来表达他对南大受承认的迫切心愿。

在李星可发动群众力量，通过他的舆论引导与舆论传达的角色，新加坡政府终在1968年5月宣布正式承认南洋大学学位。即使南大后来在1980年因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而消失，不过，无可否认的，李星可在争取华文教育权利的事工上创下了不小的勋绩。

新加坡政府后来在1979年打着“让热爱华文的新加坡人确保华语广泛应用”的号召，开始推广华语运动。持续了20多年的推广运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保持优秀的民族传统对新加坡发展的重要意义，而学习母语，有利于了解本民族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同时认识到，没有传统作为后盾，一个民族的基础则不能深厚。（吴庆棠 1997：258-263）

1992年，《新加坡华文教学的检讨和建议》报告书提出了10项主要建议和8项次要建议。新加坡华文教育因此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重新肯定了华文教学是母语教学，而不是第二语教学。

参考文献

- ，〈陈六使蔑视李光耀·委亲共博士出掌南大〉，《南洋商报》副刊，1998年9月30日，第1版。
- ，〈本报前总经理与三位高级职员·昨日凌晨被当局扣留·政府为此事发表文告〉，《南洋商报》，1971年5月3日，第1版。
- 崔贵强，1990，《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新加坡：南洋学会。
- 崔贵强，1994，《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 何国忠，2002，《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李光耀，2002，〈一种共同语〉，转载于李业霖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八打灵：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页590-598，原文取自《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
- 李星可，1965，《政论选集》，新加坡：作者自印。
- 李星可，1967，《政论新集》，新加坡：东方文化企业有限公司。
- 李星可，1968，《政论近集》，新加坡：新马出版印刷公司。
- 李星可，1991，《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
- 李星可，〈南大特委会报告书顺利完成〉，《星洲日报》，1959年11月22日。
- 李星可，〈南大的前途〉，《星洲日报》，1960年4月2日。
- 李星可，〈职业技术教育的语言问题〉，《星洲日报》，1961年4月16日。
- 李星可，〈马大星校扩展计划刍议〉，《星洲日报》，1961年7月4日。
- 李星可，〈从提倡国语到改造大学教育〉，《星洲日报》，1961年9月12日。
- 李星可，〈星加坡大学明日诞生〉，《星洲日报》，1961年12月31日。
- 李星可，〈星教部决定加强小学母语教学水准〉，《星洲日报》，1962年1月16日。
- 李星可，〈展望星加坡的高等教育〉，《星洲日报》，1962年2月13日。
- 李星可，〈东南亚教育制度的改造〉，《星洲日报》，1962年2月25日。
- 李星可，〈工艺学院今年招收华校中学毕业生〉，《星洲日报》，1962年3月13日。
- 李星可，〈教育政策调查委员会正式委出〉，《星洲日报》，1962年3月15日。
- 李星可，〈南大僵局必须迅谋打开〉，《星洲日报》，1962年4月10日。
- 李星可，〈从香港政府考虑开办华文大学说起〉，《星洲日报》，1962年5月13日。
- 李星可，〈首任星大校长拿督李光前今日就职〉，《星洲日报》，1962年6月12日。
- 李星可，〈本邦英校中的华语问题〉，《星洲日报》，1963年1月13日。
- 李星可，〈英语是否绝对不可放弃？〉，《星洲日报》，1963年1月17日。
- 李星可，〈第二语文今年是必修课〉，《星洲日报》，1965年1月7日。
- 李星可，〈南大前途的新展望〉，《星洲日报》，1965年9月14日。
- 李星可，〈关于调整南大课程的几点疑问〉，《星洲日报》，1965年9月16日。
- 李星可，〈关于促进母语教育运动的几点感想〉，《星洲日报》，1966年5月6日。
- 李星可，〈星加坡的文化革命〉，《星洲日报》，1966年9月6日。

李星可，〈如何保护母族文化传统不致丧失？〉，《星洲日报》，1966年11月4日。

李星可，〈有关教育建国大计的几个基本问题〉，《星洲日报》，1966年12月27日。

李星可，〈英文教育的真实价值是什么？〉，《星洲日报》，1967年9月19日。

李业霖编，2002，《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八打灵：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

李业霖编，2004，《南洋大学史论集》，八打灵：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

李元瑾编，2002，《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联合出版。

林水椽、骆静山编，1984，《马来西亚华人史》，八打灵：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编，1998，《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社。

林水椽编，2001，《创业与护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儒商篇》，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

林远辉、张应龙编，1991，《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罗岗编，2004，《思想文选2004》，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潘永强、魏月萍编，2004，《民间评论——走进回教政治》，吉隆坡：大将出版社。

吴庆棠，1997，《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王赓武，2002，《王赓武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王赓武等著，2002，《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转载于李业霖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吉隆坡：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页308-362，原文取自《南洋文摘》第6卷第12期。

王赓武专访，2002，〈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王赓武谈“南大事件”〉，转载于李业霖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吉隆坡：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页391-396，原文取自刘宏编《王赓武访谈与言论集》。

王慷鼎，1995，《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1945-1959）》，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汉学研究中心。

叶观仕，1996，《马新新闻史》，吉隆坡：韩江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系。

叶观仕，1999，《马新报人录》，加影：名人出版社。

曾少聪，2002，〈海外华人族群的内部关系〉，载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443-463。

郑芳 整理，〈璀璨“星系”的转型与暗淡〉，《东南快报》，2005年1月6日，www.dnkb.com.cn/news/20050105/215544.html。

周南京编，1999，《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教育科技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